

陆荣廷与旧桂系学术研讨会

论文汇编

陆荣廷与旧桂系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

2007年4月·南宁

陆荣廷与旧桂系学术研讨会

论文汇编

陆荣廷与旧桂系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

2007 年 4 月·南宁

陆荣廷与旧桂系学术研讨会

论文汇编

陆荣廷与旧桂系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

印	刷	南宁市源流印刷厂
开	本	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16
印	张	27
字	数	462 千字
版	次	2007 年 4 月第 1 版
印	次	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	数	1—200 册

广西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第 0026414 号

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

目 录

(按收到论文先后排序)

转型时期武力派与国会政派的政治较量

- 陆荣廷及桂系与 1918 年军政府改组 谭群玉 (1)
- 坚持人民立场评价辛亥革命前的陆荣廷 赵丕强 (14)
- 浅析旧桂系政府的“寓禁于征” 黎 璞 (19)
- 陆荣廷何以迟迟未响应云南护国起义? 曾业英 (30)
- 北洋时期的南北畛域观念 王奇生 (35)

南北对峙中的护法运动

- 兼论护法时期的孙中山与西南实力派 汪朝光 (43)
- 略论陆荣廷政治生涯中的三条底线 梁庭望 (57)
- 陆荣廷的“多变”、“多面”性及研究要旨刍议 董丛林 (69)
- 陆荣廷评价之再审视 谢本书 (74)
- 老桂系时期两广经贸交往及其影响 莫志斌 徐 健 覃卫国 (83)
- 旧桂系时期广西律师制度初探 刘菊香 (93)
- 儒家传统文化和谐伦理观及其对陆荣廷的影响 陈家柳 (99)

青年陆荣廷的绿林义气

- 绿林义气的形成和演绎 罗 宾 (108)
- 略述陆荣廷的重要史事 莫凤欣 (114)
- 论旧桂系的形成 黄宗炎 (119)
- 陆荣廷与辛亥革命 沈奕巨 (129)
- 简论陆荣廷的功与过 饶任坤 (140)
- 顺应与逆动集于一身

- 陆荣廷与孙中山民主革命事业之关系 黄 铮 (151)
- 陆荣廷与广西公路建设 赵明龙 (162)
- 旧桂系与社会转型时期的近代广西 廖建夏 (171)
- 浅谈陆荣廷的独特个性与传奇人生 杨启秋 (179)
- 旧桂系的烟赌禁政 谭肇毅 (185)
- 陆荣廷生平“三问” 钟文典 (190)

论陆荣廷政权在边疆民族经济融合进程中所运用的两种力量	唐 凌 (196)
旧桂系时期的广西医疗卫生	黄 琦 (214)
“改造广西同志会”	
——一个以“倒陆”和“改造广西”为职志的政治组织	吴忠才 (221)
陆荣廷集团军事行动的特点	周永光 (230)
试论陆荣廷主政时期对广西的贡献	黄卷超 (235)
陆荣廷事略	梁笑飞 (243)
论陆荣廷的军事发迹史	钟 锋 (251)
陆荣廷与广西边防	朱伦欢 (263)
浅谈陆荣廷的乡土情结	黄孟乔 (273)
论陆荣廷的历史形象	蒙力力 (280)
千秋青史有公评	
——析陆荣廷的人格	王云高 (287)
关于陆荣廷的“驱魔碑”、“驱魔诗”及其他	黄全安 (295)
旧桂系实施的改土归流述评	王 晖 黄家信 (307)
浅谈陆荣廷的生存策略	韦国友 (315)
论陆荣廷的性格特征	吴先勇 (321)
论旧桂系在壮族地区举办的教育	赵连跃 (328)
论陆荣廷军阀兴起的原因	谢 铭 (335)
孙中山“援桂讨陆”之战	唐 蹕 (341)
陆荣廷致孙中山密信试析	李调文 苏 文 (347)
陆老师银纸逼陷一大商家	
——凭祥顺和堂兴衰史	苏 文 李调文 (350)
旧桂系与军校毕业生的矛盾	黄志忠 (353)
从广西陆军将校讲习所到广西陆军讲武堂的启示	陈朝明 (360)
陆荣廷与岑春煊关系论纲	苑书义 (366)
陆荣廷的时代背景	袁正中 (370)
从大时代评陆荣廷	钱宗范 (379)
从拥袁到反袁：民国初年陆荣廷政治态度转变原因探析	李伟中 (381)
论辛亥革命时期陆荣廷的“桂人治桂”	吕秀莲 (387)
浅谈陆荣廷身上所体现的“文化多元性”	周 春 (393)
论陆荣廷主政广西的历史进步作用	何成学 (399)
陆荣廷在龙州	梁文涛 (419)

转型时期武力派与国会政派的政治较量

——陆荣廷及桂系与 1918 年军政府改组

谭群玉

民国初年，新的民主制度如近代法律、国会、民选总统等制度纷纷建立，新的政党与政治团体通过掌握中国式的议会民主机构——国会，及进入政府中枢等方式，积极参与国家政治，并力图使之按照自己希望的目标和路径，向前发展。新式武力派也披上了尊重国会、维护约法的外衣，然而却以传统的武力专制方式，时时干预实际的政治生活，并直接影响到中国政局的走向。在宗旨利害的作用下，传统意义上民主与专制、新与旧、进步与落后的政治斗争，在过渡时期体现了复杂交错的时代特点。

对于 1918 年军政府改组时期武力派和国会政派的关系，以往学者已注意到二者政治宗旨的差异，并予以是非曲直的判断，强调了南北武人如一丘之貉的相同本质，且将陆荣廷视为武力派压制民主派的典型。回归民主制度建立之初，专制体制过渡到议会政治时期，武力派与国会势力彼此内部及其间宗旨利害相互交织的历史场景，探寻陆荣廷等人参与改组的动机、条件，在不同阶段态度变化的具体原因，在改组中所起作用的实际程度，会发现真实的情况，比后人设想的要复杂得多。它从一个侧面，反映了民国初年社会转型时期，中国民主的实际程度、国会、武力派力量的具体态势，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建时期的运作特点，以及武力政治与政党政治交互作用，对政局发展趋势的影响度。

独断制下武力派与国会多数政派的联合

军政府改组的起因在于，孙中山及民友社通过非常国会建立的一人独长的大元帅制军政府，妨碍了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武力派、及其他国会政派领袖跻身政府中枢的政治诉求，从而导致了后者的联合抵制。

南方护法军政府的仓卒建立，是为证明导致旧国会解散、临时约法被废除的北方段祺瑞内阁为非法。此时在粤的国会议员，主要由旧国民党的急进派民友社、稳

健派益友社和政学会组成。在参与护法的各政派领袖中，既有在护国运动中实力大大扩张的地方武力派如桂系陆荣廷、滇系唐继尧，又有掌握新式海军的总长程璧光，也有在民国初位居临时大总统、此时为民友社拥戴的孙中山，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、益友社支持的唐绍仪，和曾被推举为讨袁大元帅、政学会的领袖岑春煊、以及曾任代理总理、此时与益友社走得较近的伍廷芳。在号称总统民选的民主时代，势均力敌、各有所长的护法领袖们，对跻身最高权位均不乏幻想，故对另组与北方对峙的权力机构均无太大歧异，矛盾的焦点在于由谁主持这一机构。

陆荣廷对主掌南方军政府心存幻想，是因为护法领袖们选中的统一机构所在地广东，此时已与广西一样，成为了桂系的地盘，而且湖南也近于其势力范围。在1916年全国副总统选举中，陆荣廷曾被作为南方代表，与后来当选的冯国璋竞争，体现该时期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实际地位。事实上，南方标帜护法后，西南六省拟设统筹机关，确实有推举陆荣廷为南方领袖的拟议和筹划，只是“未获组织机关”。^①

由于民主时代尊重国会的制度性的客观要求，加上反对段祺瑞武力专制，需要争取政治名流的共同支持，以陆荣廷、唐继尧、程璧光为代表的武力派，在军政府成立之前，就主张建立合议制政府。国会政派领袖唐绍仪、岑春煊也有同样主张。只是各自的目的大相径庭。陆荣廷、唐继尧力争进入西南政权中枢，凭借的是自己的军事实力。^②唐绍仪依仗的，则是自己在国会中议员的支持率。^③

然而在国会议员的数量和军事力量方面，此时均不占绝对优势的孙中山，利用南方各派和国民党国会势力共同反段之势，以召集非常国会的形式，抢先建立大元帅府，妨碍了陆荣廷等人主宰南方护法政权的期望，从而受到抵制。被举为副元帅的唐继尧、陆荣廷和各部长均未就职，益友社议员则在孙政府拟建立之初，就颇有异议。^④

经过护国运动，参与护法的各种政派及其领袖已经形成了力量均势，当民友社企图打破均势，拥戴孙中山独自荣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，就成了矛盾的聚焦点，引起了以陆荣廷、唐继尧、程璧光为代表的武力派、民友社之外的政学会、益友社及其领袖岑春煊、唐绍仪、伍廷芳的不满，并采用种种方法加以抵制。反对独断制的各方彼此积极联络，寻求用合议制代替大元帅制。

武力派单独操纵联合会议与国会政派的立异

西南联合会议，是护法各派共同策划的军事统一机构，但由于陆荣廷的桂系和

滇系的争相把持，并企图使之成为脱离军政府和国会的独立机构，导致了国会各政派和军政府的反对。即使是滇系，也因为与桂系对该机构领导权的矛盾，态度有所反复。以致最终陆荣廷的桂系成为南方矛盾的聚焦点，西南联合会议也未能收到实效。

最早建议并组织筹备西南联合会的，是政学会、益友社和滇系武力派，陆荣廷倒显得不太热心。1917年10月21日，益友社和政学会两系议员联名致电陆荣廷和唐继尧，主张保留军政府名义，改组内部，“另设各省军事联合会议”，由孙中山、陆荣廷、唐绍仪、伍廷芳、岑春煊等“主政其间”。^⑤其目的，一方面是想以军事联合会联络西南各将帅，同时使国会和国会产生的军政府事实上能够成立，另一方面则是想使自己推崇的领袖进入西南联合机构的首脑层。最早热心于西南联合会的组织筹备工作的，则是滇系的唐继尧和李烈钧。段祺瑞辞职后，李烈钧以滇黔全权代表名义，电请西南各省及海军各派全权代表，克期集合广州，筹商联合组织事宜。^⑥但由于李烈钧计划的西南联合会议“范围太宽，权责太重”，有从中操纵的迹象，以致西南各省未能一致赞同，并遭到陆荣廷的反对。^⑦陆期望凭借军事上的胜利，以取得组织政府的主动权，他所热衷的，是组建自己主政的政治机构。

陆荣廷在领衔南方不成的情势下，退而寻求成为粤桂湘三省名实统一的最高统率，以作为统一军令的第一步。11月10日，陆的内弟、亲信谭浩明等桂系要员，在梧州军事会议上秘密串联，倡议成立湘、桂、粤三省大都督府，以为西南政权雏形。^⑧22日，湖南各界代表会议公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，谭浩明为湖南督军，程潜为省长兼军务会办。24日，粤督莫荣新通电，主张湘、粤、桂三省组织都司令部，请陆任都司令。^⑨从而将军政大权握于一人之手，“此议后因湖南战局逆转而搁置”。^⑩

当形势于己有利时，陆荣廷和桂系积极介入了西南联合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。在岑春煊和政学会的疏通下，桂系其他将领多表赞同，^⑪陆明白其中的奥妙后，也承诺加入联合会议，并复电程璧光、莫荣新，“即请公决，速行组织为盼”。^⑫桂系对西南联合会议的介入，主要表现在积极插手其筹备、组织事宜，邀集海军、驻粤滇军军事长官以及在粤各界要员会商。

桂系对西南联合会议的控制，导致后来国会各派反对的最主要的原因，在于莫荣新、程璧光起草的作为联合会基础的《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组织条例》。该条例主要内容有二：一是削弱了西南联合会议受约法、国会限制等成分，强调该会议系受护法各省各军委托，执行政务。这必然会受到国会政派的反对。二是扩大了职权

范围，认定西南联合会享有外交、财政、军事、战和、行政等方面权力，处于与军政府平起平坐地位。^⑬明确联合会议的主持人，为军事、外交、财政、议和总代表，“轮值主席”，负责公布执行联合会议所议决、裁决事件，^⑭而桂系所拟定的各总代表中，则根本未包括孙中山。这自然要受到孙派的坚决抵制。

在桂系紧锣密鼓的操办下，西南联合会着着进行。1918年1月15日，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在广州正式成立。在粤诸名流，暨军界要人咸集于军署，履行宣誓式，“极一时之盛”。^⑮20日，莫荣新与李耀汉、李烈钧、陈炯明、谭浩明、陈炳焜、唐继尧、林葆懌、程潜、黎天才、熊克武等军事首脑联名通电，公告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条例，经护法各省各军往返电商，“一致赞同”，出师各省各军同负护法责任，群策群力，“共图根本之解决”。^⑯

陆荣廷、桂系对西南联合会议的操纵，导致了滇系态度的游离，各政派领袖的反对，孙中山军政府的抵制，以及国际上的否认。1月中旬，李烈钧密电唐继尧，担心联合会议为陆荣廷和桂系利用，因为莫荣新“太不可恃”，在其拟定的联合会组织草案中，想推陆为领袖，担心对滇系全局计划不利，进而影响滇、黔、川势力发展。^⑰李烈钧认为，只有唐继尧才是西南的“当然”中坚，希望能随时势推迁，连锁粤、湘，以滇系为中心，“造成南部大团体”。^⑱可见陆荣廷与唐继尧之间，确实存在西南领袖的竞争。联合会成立后，伍廷芳、程璧光、唐绍仪拒不就职。孙中山则以宪法为理论武器，吁请各方人士支持护法军政府，并敦请唐继尧等就任军政府元帅，争取西南地方官员的任免权，^⑲且欲统收粤省地方治权，^⑳从而“益增桂系之忌视”。^㉑同时，桂系把持的西南联合会也得不到外交上承认。据孙中山这年4月间回忆：“盖其初西南联合会，本以图外交承认而打消军政府也。及其事告成，而通告外国之时，为美领事所反对”。^㉒

西南联合会在各方反对下，名存实亡。1918年2月6日，张开儒密电唐继尧，言“近日此间政府顿生变化，即各省联合会议因受〔各〕方面之反对，现已搁浅”。^㉓2月27日，非常国会议员李华林密电唐继尧，说“联合会不能成立”。^㉔《盛京时报》认为，西南联合会失败的原因在于，其组织条例“有掌握宣战媾和、缔结条约、募集内外公债全权，并无须国会通过之规定。继因外交团不肯承认，虽经宣誓，迄未实行”。^㉕

西南联合会的失效，实际上是国会益友社、民友社与护法海军、滇系武力派及其领袖联合抵制陆荣廷桂系武力派的结果。它说明，民国初年国会制度确立伊始，

即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着重要影响。在利害的作用下，部分武力派也会与国会政派联合起来，去反对另一部分武力派。任何想脱离国会，独自把持政权的企图，均会由于道义丧失而受到舆论的群相指责。

武力派与国会政派的合议制政府的确立

陆荣廷与孙中山各自争取政权的举措，使双方势难两立。中间势力乘机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。政学系、益友社及伍廷芳、唐绍仪、程璧光等政派及个人，以调和面目出现，提出了军政府内部改组方案。他们既认为单一制的军政府不现实，也不赞成西南联合会脱离非常国会自立，主张在孙中山、非常国会和陆荣廷之间调和，即保存非常国会成立的军政府外壳，而对其内部的组织形式进行修正，将单一的统帅制变成合议的总裁制，从而达到参与政权的目的。

益友社与政学会在用合议制代替单独制方面存在共识。政学系议员汤漪声称：“军政府有政府之名，而亡其实；联合会议有政府之实，而名不符”。主张为统一护法各派起见，“将军政府与联合会议合并为一机关”。^⑥政学系议员倡议，将军政府之统帅制，改为合议制，设总裁若干人，组成限于军事范围的政务会议，隶属于合议政府之下。伍廷芳、唐绍仪、程璧光等表示赞同，在孙中山与陆荣廷之间疏通，主张合并后的联合政府，“废止总长、总代表名义，改设政务委员七人”，^⑦从而达到“以合议制均衡各派权益”的目的。^⑧

军政府改组案在主张改组的国会政派及其领袖、以及护法海军首脑的推动下次第进行。海珠会议后，各方在政学会议员汤漪起草的“联合政府组织草案”基础上，拟定了“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”草案。其主要内容有二：一、将军政府原来的单独制改为合议制，改大元帅一职为政务总裁若干人，组织政务会议，各总裁地位平等，责任同负；二、护法各省各军仍旧派出代表，组织联合会，统筹军备，计划作战，其议决事件，由政务会议施行。2月8日，唐绍仪、伍廷芳、程璧光三人联名通电陆荣廷、孙中山、岑春煊、唐继尧等，报告准备提交非常国会审议的“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草案”内容。同日，非常国会开谈话会，多数议员同意用合议制改组军政府，由改组后的军政府对内对外执行政务，护法各省联合会议作为军事机关，属于军政府。并决定由伍廷芳、唐绍仪、程璧光以及吴景濂四人，通电护法各省各军，征求同意，再由国会非常会议正式通过。^⑨

然而该改组案刚开始并未得到陆荣廷等方面的认可，以致中断了月余；^⑩孙中山

也对修正案表示不满。改组军政府主张通电护法各省各军后，桂系因在湘省鏖战中收复岳州，并顺利向汀泗桥方面推进，故湘军总司令程潜首先覆电，反对将联合会与军政府合并。接着，“湘粤桂联军”总司令谭浩明也从长沙来电反对，“这显然代表陆荣廷的态度”。^④李烈钧认为，联合政府若能平允组织则可，若是某一方想独自操纵，则“对西南局势多有不利”。^⑤孙中山则在唐绍仪等人征求改组军政府意见时，“于原定案稿，略为更变一二条”。^⑥即把“联合”二字改为“军政府”，^⑦说明此时孙并不赞成西南诸领袖平起平坐的联合制，只同意在军政府名义下的合议制。驻在汕头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2月26日致电孙中山，认为修正案“其中条例，仍不过联合会议之变相，深为诧异”，并向古应芬、汪精卫表示了自己反对的意见。^⑧

桂系与孙派僵持不下，为避免自溃藩篱，唐继尧及滇系逐渐倾向于军政府改组的折衷方案。随着在四川发展的顺利，以及势力及于陕西，唐继尧和滇系一度酝酿避开陆荣廷的势力范围另立政府，其第一步是建立川滇黔陕四省军事联合机构，3月8日，陕西靖国军全体军官会议举唐继尧为该四省靖国联军总司令。由于北方主战派的甚嚣尘上，为避免军事危机关头南方内部瓦解，唐继尧和李烈钧随后认为，将陆荣廷排除在西南统一机构之外，是不明智的。3月18日，唐继尧致电孙中山、陆荣廷，建议广东军政府和护法各省联合会合并。23日陆荣廷回电反对。^⑨

由于桂系公开反对，并继续实行以西南联合会代替军政府的计划，陈炯明一度提出联合会与军政府并存方案。西南联合会议尽管受到各方反对，但陆荣廷与桂系仍将之极力维持，直到4月。^⑩为此，陈炯明3月8日提出，“军政府与联合会议能构为一律固佳；否则，联合会议筑于武力之上，以之对内；军府筑于民意之中，以之对外，分途救国，并行不悖，义在共济，事无独专，未始非因势利导之举”。10日，陈炯明致电孙中山，希望派胡汉民代表粤军参加联合会议。^⑪孙中山复电表示，“联合会议如与军政府两不相妨，自可听其成立，现亦莫由阻止。”并同意陈的建议，派胡汉民为代表，以便“从中操纵”。^⑫这一方面说明孙能接受联合会与军政府并存的方案，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孙等无法阻止联合会继续活动。

段祺瑞第三次执掌内阁后，国内战和形势逆转，南方内部矛盾再次降为次要矛盾，抵御北方主战派进攻，成为南方各派生死攸关的共同问题。建立一个事实有效的统一调度机构，成为南方军事上的急需。孙中山、陆荣廷对于西南联合机构的态度都略有缓和，南方各派联合出现转机。李烈钧主张陆孙提携，“速求内部团结及其联合一致之方”。^⑬3月19日，唐继尧致电孙中山与陆荣廷，建议广东军政府和护法

各省联合会合并。^①

陆荣廷在桂系军事上受挫、自己的地盘处于武力危险的情形下，加上各方面的劝说，终于赞成通过军政府内部改组的方式，以达成护法各派事实上的统一。伍廷芳、林葆懌、政学会及其领袖岑春煊，以改组可扩张实力为由，一再游说陆荣廷，并想法使其他议员共同主张。^②加上此时湘桂联军从长沙、岳阳退后，北势力日张，南军势力日减。反对军政府改组者，在长岳之役后心有余悸，加上赣兵侵粤的威胁，于是“觉悟者占大多数”。^③

陆荣廷赞成改组，推动了军政府改组的实质性进展，而改组案在国会的正式通过，则体现了益友社、政学会与民友社及孙中山在是否改组问题上的对立。4月4日，陆荣廷致电赞成军政府改组，对该机构应如何筹商进行，组织完善，希与粤、桂各督“斟酌核定”。^④4月10日，非常国会初读会，以40余票多数赞成，通过了益友社骨干罗家衡、张瑞萱、褚辅成和政学会骨干汤漪、李述膺等人提议的非常国会修正案。^⑤会议推定的临时审查委员21人中，赞成改组者为17人。^⑥修正案提出第二天，孙中山邀全体国会议员到军政府谈话，说明反对改组军政府的理由决心，吴景濂、褚辅成等仍坚持改组的理由，是为了“多扩充军府实力”。^⑦改组案正式通过之前，吴景濂藉口有人组织“公民团”准备包围国会，请求地方当局派兵保护。改组过后则说，破坏改组的公民团的首领，就是民友社议员叶夏声。5月4日，也是在吴景濂极力维持下，《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》正式通过。^⑧当日，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。

当南北方和平空气上升时，日益突显的西南领袖问题，导致护法各派中的陆荣廷、唐继尧的桂、滇系与益友社对于改组进度的意见又有不同。军政府改组案通过前后，北京主战派内部发生内讧。曾经倒向主战派的得力干将曹锟、张怀芝、吴佩孚都不愿再战。段祺瑞的主战政策陷于困境。滇桂系为平衡滇、桂、孙矛盾，并方便与北方政府谋和，企图以调和名流岑春煊为西南领袖。益友社因此提出军政府不宜“率尔更张”，主张等到6月正式国会召开后再说；^⑨并希望通过挽留孙中山，抵制岑春煊等主和。^⑩实际上是企图利用益友社在国会中力量的优势，控制南方政府的选举，并避免桂系和政学会利用改组，作为牺牲非常国会，与北方议和的工具。桂系的武力强制，使益友社的补救措施未能实施。桂系制造的张开儒案，导致支持孙中山的原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被囚，次长崔文藻被杀，陆军部也被解散。唐继尧对该案采取默认态度。随后，修正军政府组织法经二读、三读会通过，军政府改组案

正式确立。

尽管在改组进度问题上，陆荣廷和唐继尧的武力派如愿以偿，但在改组后军政府的名称上，他们则受到国会政派的抵制。西南实力派曾主张，改军政府为“联合政府”，以示与原来的孙政府有别。但在改组案二读会讨论本议题时，议员们将“联合”二字删除，直称中华民国军政府，^⑤以使改组后军政府与原来军政府保持了行政上的连续性。说明尽管处于武力派势力之下，国会仍有其不可忽视的政治作用，且实际上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体现自己意志的机会。

对于军政府改组的实质，有人认为是“把大元帅的首领制取消，而改为实力派的首领合议制”，^⑥实际上合议制并非实力派独享，民意派也有分享。这从当选的各总裁所代表的各部的利益可知。5月20日选举总裁，参与南方政府首脑角逐的武力派和国会各政派领袖七人全部当选。其中，益友社领袖唐绍仪得票最多，达115票，桂系首脑陆荣廷只得90票，岑春煊得票最少，仅61票，勉强过半数。^⑦可见如果不是采取合议制，而是真的通过国会选举南方政府最高首脑，陆荣廷未必是首选。体现了当时武力派对国会影响的限度。

由于军政府改组确立的合议制，平衡了护法各派的利益，多数总裁纷纷宣布就职，军政府改组事实上成立。5月28日，伍廷芳、林葆懌首先宣布就任政务总裁。^⑧6月2日和19日，陆荣廷、^⑨唐继尧先后宣布就职，基本奠定了军政府改组事实成立的格局。29日，岑春煊从上海乘船南下，由香港转赴广东。^⑩唐绍仪、孙中山则迟迟不发表就任文电，后各自派代表赴粤代理。可见军政府虽然改组，孙中山、唐绍仪也有种种不满，但南方各派还未到达完全破裂境地。军政府使者李献文认为，军政府改组后，南方才开始有统一的政府。^⑪伍廷芳且以护法军政府名义，发布宣言，要求与中华民国有条约关系的外交国予以承认。^⑫

军政府改组的成功，实际上是使陆荣廷独自操纵西南政府的企图，变为与其他六位护法领袖共同分享。这既有北方政府武力压迫的外力作用，也是国会政派、滇系和护法海军努力奋斗的结果，及各自政治影响力的展现。在军政府七总裁中，地方武力派首脑和国会政派领袖各占一半，加上当时有很高国际声望、在宗旨利害上与益友社较为接近的伍廷芳，可见在南方政府中，武力派和国会势力一度呈现势均力敌的力量态势。当政权的体制与这种力量的实际态势达成平衡，就得到多数认同，而得以确立。

主席总裁竞争下武力派与国会政派的立场重组

军政府主席总裁的归属，是军政府改组最敏感的问题，也是引起种种冲突最主要的原因。对于岑春煊成为主席总裁这一结果，人们一般都看作是桂系和政学会运作而成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简单。

关于主席总裁人选，舆论界当时有种种猜测，主要集中在岑春煊和伍廷芳身上。主张伍廷芳为主席总裁者，有益友社领袖吴景濂、^⑨民友社领袖孙中山，^⑩以及巫山靖国联军前敌总指挥柏文蔚。^⑪此外，美国也有舆论支持伍廷芳。^⑫在改组问题上意见相对的益友社和民友社，在主席总裁人选问题上，则达成了一致。但是国内舆论界呼声最高者乃为岑春煊。7月10日，香港《华字日报》推测，南方领袖总裁，“必为岑得”。理由是岑南下后，南方军政府“精神若为之一振，既有以引起南派推举之观念，且与陆荣廷同为桂系，桂系势力膨胀，桂系之所归，当无不附和者”。^⑬

对争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，是陆荣廷和唐继尧两总裁的态度。根据修正军政府组织大纲第3条规定，军政府由国会非常会议选出的政务总裁7人组织政务会议，行使职权，政务会议以政务总裁一人为主席，主席由政务会议推定。^⑭可见，对选谁为主席总裁，政务总裁态度十分重要。作为当时“全局军事首脑”的陆荣廷和唐继尧，是七总裁中两个真正拥有军事实力的人物，他们对主席总裁人选，一致推荐岑春煊。陆荣廷7月10日通电到粤说，“主任一席尤为重要，非得沈毅明干、硕学宏才，不足以提领挈纲，以维庶政。荣廷谨依组织法推举岑公春煊为总裁主任，即请总裁诸公一致主张，即速推戴，俾其即日任事，庶军府一切政务有所秉承，要职不致虚悬，国是早以解决”。^⑮7月16日，唐继尧由行营发电，主张举岑为政务总裁主席，并“请总裁诸公一致主张，庶大政得所主持，中外共肃观听。”^⑯7月27日，唐继尧密电李烈钧、李根源，希望两人“敦劝西林毅然担任”。并“竭力周旋”伍廷芳等人，“免致隔阂”。^⑰随后，伍廷芳、林葆懌对岑担任主席总裁表示没有异议。^⑱于是，8月19日首次政务会议，岑春煊顺利当选。21日宣布就职。

在武力派与国会政派领导权争夺过程中，原本互为西南领袖竞争对手的陆荣廷和唐继尧的合力支持，致使被视为半民意派的岑春煊，终于成为南方政权的头号首脑。所以，岑春煊当选为军政府主席总裁，并非只说明武力派利害的一致，而且说明了武力派之间的相互制衡。^⑲

改组后的军政府并非是桂系独自把持之政府，而是一个国会政派与武力派共同

主政的联合政府，这可从军政府的组织大纲和政务会议条例等文字内容、以及军政府政权机构实际的人事安排两方面得到证明。前者对军政府最高权力机构政务会议的人员分布、集体讨论的重要内容、以及多数参加的开议形式，均有明确规定。^⑦后者的实际情况是，武力派与国会政派领袖在军政府中同为总裁，地位相等。武力派首脑主要掌握了陆军、海军和参谋总长等军事部门；国会政派领袖则分任了内务、外交、财政、司法等行政部门的总长。其中，陆荣廷的桂系分得陆军部，伍廷芳兼任了外交和财政总长，成为军政府中权势仅次于岑春煊的第二号人物。益友社的重要骨干、伍廷芳之子伍朝枢，则囊括了军政府的总务厅长和外交次长。^⑧而在政务会议的下属办事机构，政学会成员获得了略高比例。此外，有向政务会议建议、答复咨询的权利的政务会议参议员之职，也基本上是由民友社、益友社、政学会的代表组成。^⑨在改选后的护法国会两院正副4位议长中，民友社代表1人，益友社成员3人。显示了国会力量向南方权力中枢的渗透。

1918年军政府改组，既是对孙中山一人独掌军政府大权的大元帅制的颠覆，也是对陆荣廷独自控制西南联合机构企图的一种挫败。本次改组能够成功，在于要求改组的力量，大大超过了反对力量。它也体现了国会力量与武力派的相互制约。民国初年国会势力具有的相对独立性，是它们在护法时期举足轻重的原因。后来随着社会失序，国会的独立性逐渐丧失，声誉、威望下降，其政治作用也日趋减弱。这对中国后来的政治发展，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。

转型时期武力派与国会政派的政治较量，并非只是简单的两极对立，而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，彼此合作与斗争的渗透。在南北矛盾为主要矛盾、北方主战派大军压境时，南方的互相依存占主要方面，一旦北方军事威胁解除，南方内部的矛盾冲突会日益上升。在军政府改组的不同阶段，各派的宗旨利害，表现了同中有异，异中有同的复杂特点。各自的具体政治立场往往随利害的不断变化而时时改变，很难将是属于国会派还是武力派，作为判断每个具体行为是与非的唯一标准。同时，武力派和国会政派内部的时而为盟友、时而为竞敌，也随各自具体的利害而定。不仅国会政派与西南武力派、海军武力派之间，或者国会派内部稳健派与急进派之间，由于政治趋向、实现政治目标手段及利害的不同，在政权问题上存在冲突；即使是政治手段主张相近、而拥戴领袖不同的各个武力派、或不同的国会稳健派，也会产生利益的相互制衡。体现了转型时期武力派和国会势力各有优势、宗旨利害交互作用、彼此牵制，以及武力政治与政党政治交织渗透的政治特点。这导致政局不是呈

两极，而是呈多级的态势向前发展。

注释：

①《李烈钧建议军政府统筹借款购械密电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云南省档案馆合编《护法运动》，档案出版社，1993年版，第434页。

②谭群王《陆荣廷与西南联合会议》，《学术研究》，2003年第5期。

③谭群王《唐绍仪、益友社与戊午军政府改组》，《广东社会科学》2004年第6期。

④章炳麟著《太炎先生自订年谱》，台北，文海出版社影印本，第41页。

⑤《吴景濂陈述军政府改组计划密电》（1917年10月21日）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、云南省档案馆合编《护法运动》，档案出版社，1993年版，第432页。

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·大事记》第4辑，中华书局，1976年印，第69页。

⑦莫汝非编《程璧光殉国记》第6章，1919年版，第2页。

⑧莫世祥《护法运动史》，广西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版，第126页。

⑨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·大事记》第4辑，第69—70页。

⑩莫世祥《护法运动史》，第126页。

⑪《军政府改组案之索隐》，《盛京时报》，1918年6月5日，第1版。

⑫《西南联合会议之进行》，《民国日报》（上海），1918年1月20日，第6版。

⑬《莫荣新等征求对护法各省联合条例意见密电》（1917年12月31日），《护法运动》，第453—455页。

⑭《中国大事记》，《东方杂志》，第15卷，第2号。

⑮莫汝非编《程璧光殉国记》第6章，第5页。

⑯《莫荣新等联名宣布护法各省联合条例通电》（1918年1月20日），《护法运动》，第473—474页。

⑰《李烈钧恐联合会议为陆荣廷所利用与唐继尧往来密电》（1918年1月），《护法运动》，第461页。

⑱《李烈钧以陆荣廷顽固孤行寄希望于唐继尧密电》（1918年1月22日），《护法运动》，第479—480页。

⑲《孙文吁请南方护法人士支持护法军政府通电》（1918年2月22日），《孙文于成都攻克日清唐继尧共就元首密电》（1918年3月1日），《孙文劝唐继尧以国是为重克日就元帅职密电》（1918年3月13日），《孙文催唐继尧即日宣布就元帅职密电》（1918年4月1日），《护法运动》，第491—492、494、497、504页。

⑳《军政府欲统收粤省政权》，《香港华字日报》，1918年3月21日，第1张第2页。

㉑蒋永敬编著《民国胡展堂先生仪民年谱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0年版，第223—224页。

㉒《致陈炯明辟改组军政府事电》（1918年4月20日）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订出版《国父全集》第3册，1973年版，第557页。

㉓《张开儒请唐继尧竭力主张召开正式国会密电》（1918年2月6日），《护法运动》，第482—483页。

㉔《李华林请唐继尧来电主持调和密电》（1918年3月2日），《护法运动》，第495页。

㉕《军政府改组案之索隐》，《盛京时报》1918年6月5日，第1版。

㉖《联合政府组织草案·汤漪之拿手木作》《民国日报》（上海），1918年4月12日，第7版。

- ②《千奇百怪之广东新写真》，《大公报》（天津），1918年2月18日，第2张。
- ③莫世祥《乱世中的“调和立国”者——论护法运动时期的唐绍仪》，珠海市政协、暨南大学历史系编《唐绍仪研究论文集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版，第273页。
- ④蒋永敬编著《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，第219页。
- ⑤《军政府改组案之索隐》，《盛京时报》1918年6月5日，第1版。
- ⑥《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》，第220页。
- ⑦《致滇黔川各要人电》（1918年2月7日），杨赓笙编《武宁文牍·政略》，广州编译公司，1919年版，第11—12页。
- ⑧莫汝非编《程璧光殉国记》第6章，第8页。
- ⑨《致陈炯明辟改组军政府事电》（1918年4月20日），《国父全集》第3册，第557页。
- ⑩《陈炯明为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致国父电》（1918年2月26日），黄季陆主编《革命文献》第49辑，台北，中央文物供应社，1969年版，第137页。
- ⑪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·大事记》第4辑，第97页。
- ⑫《陆荣廷与西南联合政府》，季啸风、沈友益主编《中华民国史料外编——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》第6册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版，第57页。
- ⑬《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》，第220页，《陈炯明为联合会议与军政府职权问题电》（1918年3月9日），《陈炯明拟推胡汉民代表粤军参加联合会议致国父电》（1918年3月10日），《革命文献》第49辑，第138—139页。
- ⑭孙中山·《复陈炯明望派胡汉民出席西南联合会议电》（1918年3月13日），《国父全集》第3册，第535页。
- ⑮《李烈钧分析南北大势指出南方应求团结一致密电》（1918年2月28日），《护法运动》，第1153—1154页。
- ⑯《唐继尧声称已电商西南各省合并军政府与联合会议办法密电》（1918年3月20日），《护法运动》，第500页。
- ⑰邵元冲《总理护法实录》，《建国月刊》第1卷第3期。
- ⑱《李华林陈述军政府改组条件密电》（1918年4月29日），《护法运动》，第507—508页。
- ⑲《西南改组军政府的两方激争》，《申报》1918年4月26日，第6版。
- ⑳《改组联合军政府之内幕》，《申报》，1918年4月19日，第6版。
- ㉑南北名人言行录丛书社编《叶夏声》，第34页。
- ㉒邵元冲《总理护法实录》，章伯锋主编《北洋军阀》（1912—1928）第3卷，武汉出版社，1990年版，第292页。
- ㉓南北名人言行录丛书社编《叶夏声》，第34—36页。
- ㉔《粤事别报》，季啸风、沈友益主编《中华民国史料外编》第6册，第29页。
- ㉕《褚辅成致吴景濂等函》（1918年5月12日），董效舒等整理《吴景濂函电存稿》，《近代史资料》1980年第1期，总第42号，第10页。